



《禮運》篇《大同小康》章闡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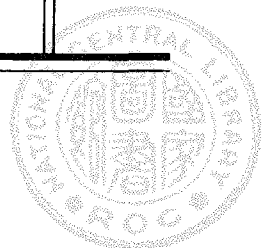
周何·前師大文學院院長

自從孫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時，標榜「天下為公」之後，大同思想即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，但提及時，每以大同篇稱之，其實《禮運》為《禮記》中之一篇，大同與小康僅是《禮運》篇中之兩節而已。又大同與小康既有大小之名，大家遂或以為孔子重大同而輕小康，其實大同與小康都是孔子所要述說的兩種政治現象。

「大同」社會，就是太平社會，是一個理想的境界。孔子標榜「大同」的目的，是指出高遠的目標，希望經由不斷的改善，最後終於能夠實現的夢境。「小康」就是小安，是指可以接受的現實狀況。然而不能僅以小康為滿足，所以必須標榜高遠的大同社會，以為努力追求改進的目標。但是所謂可以接受的現實狀況，並非就是當時現實狀況的描述，當時的現實狀況可以接受的現實狀況仍有一段距離，只要肯努力改進，是可以立刻達到可以接

受的近程目標。因此在層序上來看，孔子的意思應該是希望由現實的亂世，先求達到小康的局面，然後再求實現大同理想的遠景。

大同社會所呈現的是一切「公有」的現象，所謂「不必藏於己」、「不必為己」的「天下為公」，和歐洲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治理想非常近似。所不同的可能是在儒家的理想國中，除了必須具備國家制度以外，還須具有崇高的道德水準作為社會共識的基礎，所以孔子謂之「大道之行也」。而小康社會中，道德水準的共識顯然已經低落，已不足以維繫人心，如「以賢勇知」、「謀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」幾句，透露出完全不再崇尚道德觀念的事實。在那種「大人世及以為禮，城郭溝池以為固」，諸侯割據，天下崩析的情況之下，能夠保持小康局面者，惟有依靠「禮義以為紀」，始得不至於墮墜於牛靈茶炭的亂世。因此也可以說大同社會



崇尚德治，小康社會重在禮治。這樣斷語雖然不一定十分正確，但就重點差別的比較下，這樣說也沒有錯。

其實所謂德治與禮治，也並非絕對相反或內涵截然不同的名詞，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少的共相，甚至可以說，禮治的外圍必須保有道德的內容，所不同者，僅在於實施的方式有所改變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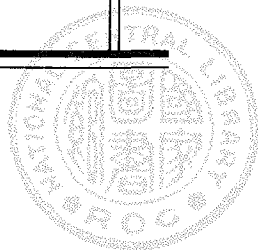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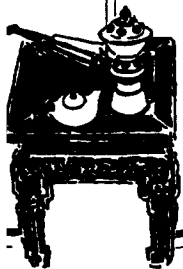
道德觀念的發揮作用，就儒家的主張來看，應該是本諸良知，自發自動，對於天理人情有所認同，而後在人我的行為中，自然表現出良性的判斷標準。孔子曾說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」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使若人人都有自我的良性判斷，根本就不會有訟爭之事。所以以德治民者，其實無所謂治，只要人人本諸良知就對了，所謂「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。」（《禮記·中庸》）所以道必須是太平時代，庶務單純，人無私念，社會福利完善，生活不虞匱乏的情況，才能達到這樣理想的境地。一旦人事漸繁，私心日重，生活艱難，那種良知的判斷逐漸模糊之後，天理人情不再具有相同的共識，人我的行為各具是非，這就需要教導群眾，懂得禮義，謹守分寸，共同建設平和安樂的社會，此之謂禮治。所以德治與禮治真正的差別，只是一則是「率性之謂道」，一則是「修道之謂教」，其根本的理念還是

在於發揮「道」的作用，則兩者並無二致。因為禮是本乎天理，根乎人情而制作的。

當人們的良知判斷逐漸模糊，天理人情的認定日有差異時，就必須有待於具有高度智慧，而且是居於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出來，訂定原則，釐清觀念，建立制度，加強教育，讓一般人民，在模糊不清，無所適從的情況中，能知有所遵循。這就是指六君子「以著其義，以考其信，著有過，刑仁講讓，示民有常」的意義。在人們知道行事皆有常規之後行之既久，潛移默化，自能領悟到這些常規行的背後，當初設計安排的心意何在，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須待啟發提示的天理人情，而能認真奉行，不再模糊懷疑。所以《禮記·中庸》說：「自誠明，謂之性。」是說德治的方式是由本身認真體會而自然明白天理人情；「自明誠，謂之教。」是說禮治的方式是利用教育讓你領悟之後，再認真去實行；但是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」其最終的結果卻都是一樣的。

當然，說是結果一樣，仍屬於一種理想的期待也是正面效果的說明。遇有負面意識的成長時，率性而為，未必就是道。道德標準會因時代不同、環境不同而有所轉向時，去人欲，存天理，未必人人盡能，未必社會全同時，儘管開悟不斷，而實踐確有困難，主張德治者勢必扼腕歎息人心不古，世風

◎思想與文化◎



日下，而別無良策，主要原因在於道德觀念只有誘導性，卻沒有絲毫的約束性。禮治則不然，禮制具有約束力量，訂定共遵共守的生活規律，建立社會秩序，國家體制，則人人必須奉行不渝，不容許有人隨意歪曲或破壞。曾子曰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」（《禮記·大學》）在群體生活，社會輿論的監督之下，禮制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約束力量。這就是在「大道既隱」之後，孔子刻意標榜小康社會以禮義為綱紀的原因。因為禮義的建立，根乎天理人情；同時又有許多具體的儀式制度，便於人們共同遵行；還有相當程度的約束力量，足以保護固有的道德觀念，這才是禮治社會真正的價值所在。

如果禮制中的道德觀念逐漸流失了，禮制便形成毫無意義的虛文。現今是法治社會，法比禮更具

有制裁力，當然很好。但如法制破壞了傳統的禮制，更放棄了固有的道德，這種法制也是毫無價值，更不是我們中國人所需要的東西。

孔子生長於混亂的時代，諸侯各自為政，戰爭頻仍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，故孔子崇揚堯舜德治禪讓政治，修《春秋》，於凡能讓國者，如魯季子，吳季札等竭力讚許，《三傳》中隨處可見，這些都是王道思想的體現。然而孔子也知道王道德治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，須得循序漸進，才能達成理想，所以《春秋》雖然旨在尊王，但是鑑於現實環境的已然如此，因此對於以力行仁，五霸之首的齊桓公還是有很多頌讚之語。在拙著《春秋三傳崇霸論》有詳細的舉證和說明（文載國立編譯館館刊，稿已清校，近期即將發表），《春秋》尊王兼且崇霸，正如同本文所說的大同而兼言小康。 □

文人書趣

宋人頗重手工抄書，並以其幫助記誦。如宋祁嘗言：「手抄《文選》三過，始見佳處」，洪邁亦謂：「手抄《資治通鑑》三過，始究其得失」，陳鵠《耆舊續聞》載：「蘇軾貶謫黃州，亦曾以手抄《漢書》為日課，及至抄成，誇以為『貧兒暴富』」。 □